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四

新聞战綫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

邓 拓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四

新聞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8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
直属机关俱乐部的报告)

邓 拓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报告之四
新聞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邓拓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13/16印张 15,000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0

统一书号: 3009·86

定价(5)八分

編 者 的 話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屬机关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在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認為有必要对机关干部进行一次比較系統的社会主义教育，介紹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基本經驗，闡明当前党和國家的基本政策，徹底粉碎右派右子的謬論，并进一步提高机关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为深入地開展正在进行的整風运动創造有利条件。因此，决定联合組織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邀請中央負責同志做若干次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各級干部的热烈欢迎，普遍要求把报告記錄整理发表，讓大家更深入地进行研究。現分別征得报告人的同意，除各次报告在学习杂志上刊登外，同时汇編成冊，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滿足广大干部的要求。

社会主义教育报告会办公室

1957年12月29日

目前我国新聞界正在努力整頓思想作风，整頓队伍，改进工作，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高潮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我們有必要就我国新聞界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表現的思想政治情况和实际工作中的若干問題，作一个初步檢查，吸取經驗教訓，寻求更好地改进工作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新聞事业。

新聞队伍必須整頓

新聞战线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最尖銳的一条战线。在我国过渡时期，报纸、刊物、广播等各种新聞工具不但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特别是进行工农业生产，向自然界展开斗争的有力武器。怎样做好新聞工作，这是一門重要的学問，它在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新聞工作上和新聞学領域中的斗争，同政治斗争常常紧紧地連在一起。在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新聞战线上斗争的尖銳程度是空前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

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全国的新聞工作者在这一場革命斗争中經受了重大的考驗。新聞队伍的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的严重情况，也在这个斗争中暴露了出来。

混到我国人民新聞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的进攻是蓄謀已久的。他們有計劃、有組織，有言論、有行动。他們在新聞界发动进攻的力量，从現在看来，大体可以分为兩部分。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新聞界的头目，如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陆貽等，他們率領了一班婁罗，以光明、文匯兩报为主要陣地，南北同时大举进攻。后来发现，他們还准备了几个“班子”，企图进一步篡夺新聞日报和新民晚报，也打算篡夺大公报。当时有一批自称为“老报人”的，如顧执中之流，揚言要“归队”，到处“接綫”“挂鉤”，一心以为这是他們在新聞界进行倒算和复辟的好机会。他們沒有料想到他們的野心和梦想会那么快就破灭了。另一部分是混入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这部分人有极端濃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修正主义的面目出現。这批人包括王中、刘宾雁、范四夫、彭子岡以及其他叛变分子、內奸分子。他們从各个側面配合党外的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行惡毒的进攻。

这两部分右派分子合成了一股反动的力量。他們的表現虽有不同，但實質上是一样的。他們有相同的綱領，唱同样的調子。他們之中，虽然有的曾經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但是他們实际上一直沒有改变他們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頑固地

堅持着他們的反動立場。在社會主義革命進一步深入的時候，他們終于暴露了自己的原來面目。

這些右派分子在新聞戰線上首先發動進攻不是偶然的。現在看來有三個原因：第一，資產階級右派懂得報刊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儘管他們極力否認報紙的階級性，並且以此為理由大肆攻擊無產階級的新聞學，但是他們在行動上卻極力抓住這個武器，奪取這個武器，興風作浪，發動進攻。第二，新聞工作者隊伍中既然混進了一批右派分子，他們就得到了許多有利條件，能夠從革命的堡壘內部來發動進攻。第三，我們新聞界的隊伍在思想上不純潔的現象是很嚴重的，不少新聞工作者，有相當濃厚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這就給右派分子提供了活動的地盤。

全國人民的反右派鬥爭實質上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新的情況下的繼續。我們應當在思想上劃清社會主義報紙和資本主義報紙的界限，努力消除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要提起高度的警惕，隨時揭露那些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實際上販賣資產階級貨色的修正主義思想。這是長期的任務。這個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就是社會主義繼續發展與鞏固。每一個新聞工作者都不能不抉擇自己的立場。這個時期的實際鬥爭的結果證明，我們新聞界的大多數人是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向右派分子開火，因此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管資產階級右派有多大能耐，提出一套什麼迷人的口號，他們終于失敗了。

新聞界右派分子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事實還告訴我們：

第一，應該尽量通过报刊，讓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許多毒草放出来；然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把它們鋤掉，变成肥料。第二，在全国二万七千多名新聞工作者中，絕大多數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一部分骨干經過了革命斗争的鍛煉。这个队伍的主要部分基本上是可靠的。右派分子企图篡夺这个队伍的領導权只是他們的妄想。第三，我国人民的新聞事业的发展情况，充分証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前夕，全国报纸发行总量只有二百五十万份，而現在是一千五百万份左右。中国历史上一般报纸的发行量沒有超过十万份的，而現在报纸发行十万份的却一点也不希奇。广播和其他新聞事业也都有很大发展。現时全国新聞事业比解放初期发展了六倍。在这个事实面前，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新聞事业的一切謠言不攻自破。

現在我們要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切实改进我們的工作。这是我們的方針。我們要狠狠地反右派，也要狠狠地改进工作，首先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整頓我們的队伍。我們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聞工作者的强大队伍。这个新聞队伍應該成为我国无产阶级知識分子大軍的一个組成部分。这个队伍必須又紅又專，并且要紅得透、專得深。現在的條件十分有利於我們来建立这样的一支新聞队伍。因為我們进行了严重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偉大的胜利。1957年6月以前是右派分子向我們猖狂进攻，造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1957年6月开始，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大举反击，出現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有利形势。一部分本来受了資產阶级影响的新闻

工作者，由於他們一向所依附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正被消滅，他們逐漸地提高了政治覺悟，看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表示願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依附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面來。只要我們決心繼續改造和整頓新聞隊伍，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的作用，並且積極培養新聞工作者的新生力量，那末，無產階級的新聞隊伍就一定能夠建立起來，正如整個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大軍一定能夠建立起來一樣。為了這個目的，狠狠地從政治上、思想上整頓我們現有的隊伍，改造現有的新聞工作者就具有決定的意義。我們必須繼續認真地清除資產階級的思想毒素，使每一個新聞工作者死心塌地，為社會主義事業、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忠誠服務。

為誰服務是根本問題

為誰服務——這是新聞工作的根本問題，也是新聞學理論的根本問題。

任何報刊及其他新聞工具都有它的階級性，它們都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這是客觀的事實，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一個基本原理。但是，右派分子卻極力要抹殺新聞的階級性和党性。他們惡意歪曲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他們硬說“在中國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報紙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了。”他們根本不敢引用毛主席講話的原文。毛主席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

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现在一方面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还有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吗？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不但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武器，而且仍然不能不是敌我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的任务显然更加复杂了，因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地处理，这是一个新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右派分子发现了我们在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弱点，乘虚而入，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原理，散布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企图影响和改变我国人民新闻事业的方向。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前的系主任王中，就是他们的代表。王中虽然曾经是共产党员，但是在思想上却早已投降了资产阶级。他在全中国解放之后，就到了上海滩，拣起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破铜烂铁，来武装自己。还在党开始整风之前很久，他就到处散布他的修正主义的新闻学观点，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马

克思主义的新聞学領域和社会主义的新聞战线上的代理人。王中的新聞学因为貼着馬克思主义的标签，魚目混珠，到处騙人，所以流毒特別大。

王中的“理論”核心是所謂报纸的“兩重性”。他說报纸首先具有“商品性”，在商品性的基础上才能說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他看来，报纸不过是一种商品，报纸和讀者的关系只是五分錢的买卖关系，讀者首先是把报纸当成商品买来了，然后才受到报纸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的影响。他举了很多例子，如中国古代的“开元杂报”和古羅馬凱撒大帝办的“每日新聞”等等，来証明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的这一套說法完全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誰都不能否認，中国古代的“邸报”，包括“开元杂报”在內，乃是封建宮廷的报纸，它們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維護其封建統治，用来向他的臣子傳達法令、报道朝廷情况的。这些“邸报”难道能离开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目的嗎？同样，凱撒大帝办的“每日新聞”也不例外。我們現在无法看到这个报纸，只能从間接的历史紀錄上知道一些。王中怎么能够武断地說从内容上看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全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呢？据“大英百科全书”記載，这个报纸創刊于紀元前六十年，專門登載政府公报和命令。光从这一点看，能說它不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嗎？在这里，还应该提到我国南宋初期出現的很多小报。当时宋朝受到契丹、女真的进攻，統治阶级內部起了分化，有主战、主和兩派。当时的宮廷官报是主和的，因此不登关于主战的言論和人民自动起来抗战的情况。于是小报出現了，提

倡抗战，报道人民武装斗争的消息。官报和小报之间的斗争不是反映着阶级斗争吗？这些是历史上的情况。至于说到现在，那末，资产阶级右派章罗联盟紧紧地抓住文汇、光明两报作为他们的工具，这不是为了他们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同王中相反，认为报纸首先不是商品，报纸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有当报纸成为近代化企业的时候，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它才需要计算成本，计算盈亏，并且它的发行工作要经过邮政，经过市场等等。仅仅是在这些现象上，新闻事业与其他企业，特别是商业性企业，才有某些相近的地方。除此以外，报纸根本不同于商品。试问当今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办报首先是为了五分钱呢？可以毫无例外地做出全称肯定的判断，人们办报首先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其他。

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发动广大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而奋斗。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工农劳动人民的最大多数的最高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右派分子如王中之流也说要为人民服务，也说要根据读者和社会需要办报。但是他们对读者和社会需要不做阶级分析。王中所进行的社会需要的调查，尤其是骗人的。

王中宣称他曾到无锡工厂做过调查，他说：“有一个工人说：我家在农村，但天天要上班生产，没有时间去打听农村的

情况，就很想了解农村的消息，需要在报纸上读农村的消息。有一个纺织女工，她的丈夫是三轮车工人，她不一定很需要看报纸上的纺织厂消息，她也要知道三轮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从表面看来，王中似乎也很重视工人群众对报纸的意见和要求，然而，在实际上，王中显然别有居心，他通过这个调查却莫名其妙地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花五分钱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就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简直叫人不懂得是什么逻辑。这是王中抄袭美国盖洛普按照“横切面定律”进行所谓民意测验的方法，它是资产阶级捏造“民意”欺骗社会的把戏，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报刊和其他新闻工具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如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它必然要为一定的基础服务，它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在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报纸似乎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办报纸，资产阶级也办报纸；报纸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谁都可以利用它，把它作为战斗的武器，如同飞机、大炮、机关枪一样。但是，报纸毕竟不同于飞机、大炮、机关枪。一切枪炮武器离开了人就没有阶级性，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报纸却仅仅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才可以为一切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利用。然而，报纸离不开具体的内容，它要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因此，从具体内容来说，它就有了阶级性。抽象的报纸是不存在的。比如大字报，

右派出过，我們也出，都叫做大字报。但是，这些大字报都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政治内容，这些内容就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右派分子推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聞事业，說它們是商业性的，是超阶级、超政治的。事实究竟如何呢？英国的路透社自命为“商业通訊社”，但它是从英国政府那里領津貼的。應該說，路透社所发出的新聞，从来都是为大英帝国服务的。至于美国的許多新聞机构由美国新聞处在背后操縱，更是人所共知的了。美国新聞处每年补助各方面的錢，約有一亿美元，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員大約有一万人以上。受到津貼补助的，有几家大报纸。它还办了許多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以及鼓动匈牙利事件的“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它在世界上七十六个国家中拥有二百一十个新聞中心，有的是广播，有的是刊物，还有用私人名义办的以及国际性的新聞事业共三百四十家。它的資金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兩大財团供給的。这就足够說明他們的新聞事业究竟是商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了。

任何报纸、通訊社、广播电台等新聞机构和每一个新聞工作者个人，在阶级社会中，都不能不根据他們所服务的阶级的利害关系，对于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报道。比如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西欧通訊社說它是“群众起义”，而事实明明是反革命势力要推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明明是反革命案件。西方通訊社为什么要顛倒黑白呢？这就因为西方的新聞記者的报道受了壟断資本家的利益和政治观点的支配。卡达尔同志对匈牙利地方記者說过，西方通

訊社为什么不报道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不报道法国码头工人罢工，偏偏报道匈牙利国内工人的鬧事呢？当时帝国主义供給了反革命分子以大批的武器彈药，却伪装說那些是医疗药品。他們还从奥地利等国派了大批間諜、特务、軍事人員潛入匈牙利。对于这些，西方通訊社在消息中是不肯报道的。我們能說它沒有政治目的嗎？右派分子說：“新聞和語言一样，可以为任何階級服务。”这样的說法在事实面前不是显得极其荒唐嗎？

有些“老报人”还說从前的大公报是超階級的。那么，我們再来看看它是怎样的“超階級”吧。王芸生先生在北京新聞工作者座談会上曾經揭露张季鸞向他說过的“知心話”：“你天天写社論，要記住我跟蔣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評。”这就完全戳穿了张季鸞和旧大公报的政治嘴臉。张季鸞本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曾連續写了四篇社論：“西安事变的善后”、“再論西安事变”、“給西安軍界的一封信”、“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国民党曾將“給西安軍界的一封信”加印了十万份，派了飞机散发给张学良、楊虎城的部队。这能說旧大公报沒有成見，沒有政治背景，是超階級的嗎？我們說報紙是政治斗争的尖銳武器，它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嗎？

我們从来不避諱而且明确地运用新聞报刊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我們确信列宁所說的：“報紙不仅是集体的宣傳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組織者。”在我們办报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生产运

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以及最近的反右派斗争，都可以证明列宁的这个命题的正确。只有王中、范四夫之流才狂妄地攻击列宁的命题，说它是“过时”了。这一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狂妄已经达到了极点，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无知。

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为了贩卖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来歪曲、修正以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他们把报纸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完全对立起来。他们否认阶级性而抽象地强调人民性，其实他们也否认了人民性。因为抽掉了阶级性，也就失掉了人民性的根本条件。目前人民内部还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而且先进、中间和落后的这种差别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存在。在许许多多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中间，当然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这就必须用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来加以衡量，而不应该抽象地笼统地去对待它们。离开阶级性的抽象的人民性根本不可理解。

我们必须同右派分子坚决地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保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途而奋斗。

两种新闻自由

在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人们都曾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新闻自由”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我们的新闻不自由，新闻受到“封锁”；或者说我们管得太多，管死了新

聞自由。他們要爭取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要求所謂絕對的無限制的新聞自由，目的只是要讓資產階級有絕對的無限制的新聞自由。他們又惡意地歪曲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自由的學說。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中指出：“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我國人民現在享受着充分的民主自由。去年下半年以來，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大大地發展了。這是同資產階級的自由相對立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把資產階級的自由打倒，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利。去年上半年，大家不是聽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大嚷大叫嗎？那時候他們要共產黨下台，要無限制地發展資產階級的自由，把中國推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當時新華社有個叫鄒震的，是留美學生，他學的是資產階級新聞學。他要中共中央宣傳部為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開放綠燈”。他攻擊黨報有三大缺點：一是有些話不敢講，二是有些話不便講，三是有些話不准講。人民日報也有個右派分子叫蔣元樞的，大肆攻擊人民日報的領導人員只按照黨中央的意圖辦報，說這就是“聖旨口”、“緊箍咒”，束縛了他的天才和積極性。當時還有人說人民日報不登關於北大“民主牆”的消息是“胆小”。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講演以後，居然打電話“警告”我，說：“如果人民日報不登，會有很壞的後果。”我的